

商朝帝辛的都城在朝歌

□燕昭安

明清以往的史籍记载中 没有人对纣都朝歌提出过异议

至清末的历史经典著作,几乎众口一词,没有人提出过异议。从《尚书·周书》、《竹书纪年》,到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、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、《汉书》,所载史实均可证明纣都朝歌。《后汉书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晋书》、北魏郦道元的古代地理名著《水经注》,唐代地理志《括地志》、《旧唐书》,唐人为《史记》所著的注疏、正义,唐代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宋人编撰的《续博物志》,北宋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,清人徐文靖对《竹书纪年》的注疏以及明清两代众多版本的《河南通志》、《淇县志》、《卫辉府志》等,都毫不含糊地确认朝歌是殷纣帝都。

近现代罗振玉所著的《殷墟书契考释》,白寿彝的《中国通史纲要》,郭沫若的《中国通史》、《中国史稿》,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等也都对此作了充分肯定。

纣都朝歌,影响深远,无法回避,所有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它。当代历史学界的泰斗、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说到纣都朝歌时讲:“这绝不是囿于传统的成见,而是由于这一说法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依据。即使完全撇开汉以后的记述,还是可以找出论证的线索”(见李学勤为田涛的《纣都朝歌》撰写的序言)。

盘庚是商朝第十九个帝王(若算上“未立而卒”的太丁,盘庚是第二十个王),他把都城迁到北蒙(今安阳小屯一带),他后面还有十一个王。史书上认为帝辛(纣王,第三十王)以朝歌为都城,与盘庚迁都安阳是不矛盾的。

朝歌及周边仍有 上百个与纣王有 关的地名

从某种意义上讲,地名是历史的“化石”。历史学家考据某段史实时,若能发现一两个与之关联的地名,往往会欣喜若狂。而与纣都朝歌有关的地名,不是一个两个、十来个,而是整整一个系列。

朝歌的殷商遗迹很多,从殷纣遗址演变的地名,更是数不胜数。西有纣王殿、殷故宫(在朝阳山),东有纣王墓,城内有商纣王的摘星楼遗址,商代大臣比干剖心处摘心台,纪念箕子、比干、微子的三仁祠,城南原有箕子庙。

此外,还有纣王以酒为池“观牛饮”的酒池,纣王牧野兵败后背城一战“血流飘杵”的薛(血)村,纣王游乐禽兽的北海子(三海),纣王围猎的鹿犬城(古城),纣王养鹿的地方鹿厂(许沟附近),纣王养鱼处殷鱼池(鱼坡),纣王祭天的郊台(大屯西北),纣王观朝涉的折胫河,纣王屯兵处朝歌寨,殷将黄飞虎镇守的淇水关(高村),纣王的饮马池(泉头村南)。

再看外围,朝歌西南的孟津、孟县,均因武王伐纣时与八百诸侯在此会盟而得名;今焦作东11公里的待王镇,因纪念百姓慰劳武王军队而得名;修武县因武王在此安营扎寨练兵习武而得名;焦作东北的安阳城,得名于武王军队遇雨而“安营待阳”;新乡、卫辉之间的牧野,是“牧野大战”旧址;武王与殷纣王牧野大战时,以武陟为大本营,武陟县名由此而生(陟意为登、进、兴);今朝歌以南十多公里处有比干庙;以北三十多公里有纣王囚禁周文王的羑里城;东北十公里处的钜桥是殷朝屯粮之地;西南八公里处的鹿台,是殷朝藏置财物珍宝之所,北十五公里处的大赉店,因武王攻占朝歌后“发钜桥之粟,散鹿台之财,大赉于四海”而得名(大赉即赏赐);武王伐纣后,于西亳筑城,“息偃戒师”(停止战争之意),于是便有偃师这个地名。

此类地名还有许多,读者可参阅笔者所著的《解读朝歌》一书中的《与殷商帝都有关联的地名》一文。

朝歌一带自古流传 大量关于纣王的民间传说

民间传说,是绵延于人民口头的历史。在朝歌,乃至临近县份,流传着很多关于殷朝特别是纣王的传说。人们孩提时代依偎在祖辈怀里,首先听到的便是又古老又新奇的殷纣故事。此类传说之多,以至于前几年淇县文化馆收集整理《民间故事集成》时,删掉大量内容类似的,即便如此,仍需独辟一辑《纣王的传说》。明代许仲琳正是在这丰富浩繁的传说故事基础上,写出一部文学名著《封神榜》。

纣都朝歌 在学术界重新得到认可

民国初年,历史学界有一股“疑古之风”,个别极端的疑古派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一概采取怀疑、一概采取不信任的态度,对新的考古发现随意发挥想象,以颠覆定论为能事。

其实,中国古代学者有着优秀的传统,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,是对得起文人的良心的,特别是“史官”,讲究所谓的“史德”,功利心比近代、当代学者要少得多。

事实证明,“疑古之风”推翻的历史定论,后来又新的考古发现证实,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的观点。“疑古派”不信司马迁,不信《汉书》,后来马王堆、汉简等文物新发现又反过来证明了司马迁的正确。又如《尉缭子》一书,曾被怀疑为“伪书”,后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残简出土,证实了《尉缭子》的可靠,“伪书”之说不攻自破。还有姜太公的《六韬》等也均如此。

著名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曾经这样讲过:“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是进步的,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,有很大进步意义,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,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,当然很好。可是它也有副作用。疑古派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,特别是对古书搞了很多‘冤假错案’,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……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,将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。”

认清纣都朝歌问题,需要进一步对历史文献和现有文物考古发现进行研究,在此基础上加大田野考古勘察的工作力度。

近些年,对于帝辛在朝歌做都城,先秦史学界的争议在逐渐缩小,逐渐重新达成纣都朝歌的共识。篇幅有限,在此不再赘述。

众多历史事件是纣都朝歌的重要佐证

作为在位52年又颇具个性的帝王,殷纣王留下了许多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史实、典故,而这些史实典故又无一不与朝歌联系在一起。比如殷末的《朝歌》之乐、微子出走、箕子佯狂、比干剖心、武王伐纣、牧野之战、鹿台自焚等。

牧野之战的地点在朝歌城南四十公里,武王伐纣打到朝歌就宣布胜利,并掳掠了商朝的九鼎国器,班师回去了,这是诸多史料都有记载且有文物可考的。如果朝歌不是纣都,怎么会打下朝歌就宣布了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商帝国的终结呢。

周武王伐纣后,把在朝歌居住的所谓“殷顽民”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来统治,但他不放心,把朝歌以北的地方封为“邶”,以东封为“卫”,以南封为“鄘”,周武王把他的兄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分别封到这三地,以监视武庚禄父所在的朝歌,
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三监”。《诗经》中的“邶风”、“卫风”、“鄘风”便是这些地方的民歌,而这些诗歌中有许多歌颂“沫乡”、“淇水”的诗句。如果朝歌不是纣都,那么所谓殷顽民、所谓“三监”统统没有了存在的基础。

西周至春秋中期,朝歌为卫国国都长达383年,这在史书上有详尽记载,并有卫国古城墙、卫墓出土的青铜器“沫司徒”簋的铭文等文物佐证,没有什么争议的,而卫国就是建在原“商都”。

有一些学者因为《竹书纪年》中“盘庚迁殷不徙都”这一句话,怀疑朝歌为殷末帝都。殷纣王是个有争议的人物,我国悠久的历史从殷纣王开始愈加丰富绚烂。如果否认朝歌为殷末都城,那么许多有关殷纣的史实将失去依托,这段早已深入人心、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。

纣都朝歌有大量的考古文物佐证

怀疑纣都朝歌的学者总是强调一个理由:纣都朝歌没有考古发掘方面的实物证明。

其实,朝歌尽管没有挖出甲骨文和完整的城址遗迹,但还是有着大量的考古文物佐证的,比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三段“卫国古城墙”。

卫国设立与武王伐纣仅隔三年,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记载卫康叔主政的卫国,其都城朝歌就是原来的商都,在“故商墟、居河淇间”。我省著名考古学家曹桂岑先生等许多学者认为,卫国古城应是商末朝歌城墙。

朝歌城内的摘心台,也是商纣王时期的遗迹。朝歌及周边近百个与商纣王有关的地名,也是历史的“化石”,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
朝歌的纣王墓,是世上唯一的纣王的寝陵。中国社科院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所著的《殷墟:一个王朝的背影》中记载:在殷墟“西北冈”的

王陵区共发现九座王陵,其中八座墓葬都是带有四条墓道的大墓,唯独纣王的墓仅有墓室,没有墓道,是一座没有完工的半截子工程。

1976年,考古人员在陕西省临潼县零口乡西周窖藏出土了西周青铜器利簋,其中的32个字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时间、地点等,与《尚书》记载的牧野之战完全吻合,也进一步证明了《尚书》对这段史实的记载的正确性。

反过来说,怀疑纣都朝歌的学者,不但拿不出多少可以证明观点的文献或历史资料,同样也拿不出可以说明问题的文物。

暂时没有完整城址那样的重大文物发现,并不能就轻易推翻几千年来众多的历史文献。世界第八大奇迹、面积达20780平方米的陕西兵马俑那么大的阵势,二千多年来一直未被发现,你能说在1974年那几个农民打井打出陶俑头以前兵马俑是不存在的吗?